

世界政治中的 战争与变革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OBERT GILPIN

[美] 罗伯特·吉尔平 著

宋新宁 杜建平 译 邓正来 乔娅 校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世界政治中的 战争与变革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OBERT GILPIN

[美] 罗伯特·吉尔平 著

宋新宁 杜建平 译 邓正来 乔娅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美)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一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SBN 978-7-208-15665-4

I. ①世… II. ①罗… ②宋… ③杜… III. ①国际关
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1759 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宋新宁 杜建平 译

邓正来 乔 娅 校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4
字 数 199,000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665-4/D·3356
定 价 48.00 元

谨此纪念哈罗德·斯普劳特

重大的历史事件常常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其他重大经济原因长期的变化所致；而这些变化因其渐进的性质而逃离了当代观察家的注意，它们实为政客的愚行或无神论者狂妄的产物。

——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摘自《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序

布赖恩·巴里(Brian Barry)在其1970年出版的杰作《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民主》(*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一书中,曾划分并分析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理论建构方面的两种最重要方法——理论建设的社会学模式和经济学模式。为求得对国际政治变革的理解,本书将吸收这两种社会理论所提供的见解。无疑,上述两种理论各有建树,但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将只把它们视作一种启迪,而不是应予完全使用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还得简要地探讨一下它们的长处和不足,以使读者熟悉本书的理论背景以及方法论基础。

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整个社会体系。诚然,对社会体系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它们都有一系列可证明是同一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突出特征是具有明显或隐约的相互关系。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其他社会角色,社会学理论都假定:个体行为要由其所处制度的性质及其在该制度中的地位来解释。社会体系是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其影响不是通过一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使行为者社会化,就是通过对行为者施加各种约束来实现。总之,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社会体系本身必须是理论建设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或者某些学者所称的理性选择理论,则与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方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它假定,个人行为是完全由合理性来决定的(Becker, 1976:5; Rogowski, 1978)。个人力图在付出尽可能低的成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或至少是满足)某些价值或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合理性只适用于努力过程,而不适用于结果;因无知或某种其他因素而不能实现某一目标,并不能说明下述推理的前

提是错误的,即个人在成本与利益或手段与目的的核算基础上行事。最后,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将力图实现其目标直至实现市场均衡;也就是说,个人对某种目标的追求,要在相应的成本与已实现的利益相等时才会停止。经济学家正是极力按照这些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假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

社会学方法的长处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个人行为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决定因素上。在一个有原则和规范的世界里,个人的抉择和行为并不是完全由自己来决定的。况且,这些限制性的原则和社会结构也不能完全使个人变得自私自利;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认为个人是按某些与其自身利益相对立的方式行事的。当然,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个人会(通过个体、群体或国家)谋求原则和结构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永远不能完全逃脱社会结构的各种限制。此外,正如珀西·科恩(Percey S.Cohen, 1968:126)所强调的那样,尽管个人和群体想增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行为却常常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无论自身利益还是社会结构,都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理论的优点是,它体现出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一般概念,而这种概念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的变革。约翰·豪尔沙尼(John Harsanyi)认为,社会变革问题“最终要从一些人改变自己行为的个人动力方面去解释”。这就是一种变革理论。它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会断定,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利益”(Harsanyi, 1969:532)。它的焦点,集中在解释技术的、经济上的及其他方面的变革,是如何影响权力和个人(组织在联合体和国家中的个人)利益,并由此影响他们去更正自己行为和调整其制度机构的。

这种社会或政治变革的经济规律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之上:社会制度的目标与性质,主要是由其个体成员的自身利益和相应权力来决定的。用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966:26)的话来说,“政治结构被看成是某种源出于个人参与者的选择过程的东西”。个人、群体以及其他行为者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创造那种他们认为能增进其利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因而,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制度之目标,也主要反映其较有权势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一旦这些个人的(或群体和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改变原有制度及其目标的企图,以反映利

益和权力上的重大变化。

这种理性选择理论的第二个长处在于它可以依赖经济学理论中许多经过多次考验的观点。事实上,经济学提供了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行为理论。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经济学理论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广大领域;有时还被运用到诸如自杀或婚姻配偶选择这类通常被视为非经济行为的现象中。其运用之广,已接近荒唐可笑的地步。然而,只要我们运用得当,那些所谓的微观经济学规律,如需求规律、边际效用率、利润递减规律等,以及那些国家财政和其他经济学分支中的理论,都会有助于解释政治行为。

可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对国际政治变革的研究,必须考虑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相应收益(权力)的,又是如何影响为实现群体或国家追求的目标所需付出的成本的。在这些目标中,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群体或国家利益的社会政治安排。本书也将证明,为与那些增加相应的权力或减少修改政治安排所需付出的成本的情势发展相适应,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都会力图变革其政治体系。而且,这种努力要持续到进一步变革所需的成本与可获得的利益之间达到均衡才会停止。¹

作出以下假定固然是有益的,即社会体系和政治制度的产生是由那些追求眼前利益的强有力的行为者决定的。可是,其后所产生的社会安排却不能完全随这些行为者的意志而转移或控制。而且,一旦社会和政治制度安排就位,就会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譬如,消费者或销售者的个人行为导致经济市场的形成,但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上,这些个人却不能控制他们购买或销售的商品的价格。同样,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1979)说过,每个单个国家共同组成了一种国际体系,可它们对该体系的运作只能进行有限的控制,它们还得在不同程度上顺应这个由相互作用的国家构成的、相互竞争的无政府主义体系的自身逻辑。华尔兹的见解,指明了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方法(或者体系方法)的价值。

由于本书既要分析近现代世界,还要分析此前社会的政治变革,这就出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经济学理论是否普遍适用?其效用是否仅限于由追求理性的自身利益,并且贪得无厌的个人所组成的市场经济社会

呢?²本书将假定,合理性既不受历史,也不受文化的局限,但是所有社会(包括过去和现在)的个人都企图通过其可能的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去获取他们的利益,实现他们的目标。不过,个人所追求的特定利益或目标,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手段适当与否,则是由当时占优势的社会规范和他们所具有的物质环境所决定的。鉴于此,尽管我们于本书中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以求得对政治变革问题作出理解,但我们也认为,社会学观点对理解合理性行为的来龙去脉同样是必要的。一言以蔽之,要解释国际政治的变革,就必须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这本书将把社会学和经济学探讨社会理论的方法都吸收进来,以期形成一种国际政治变革的理论或概念。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两种社会理论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即使每种方法都能部分地弥补对方的不足,可是两种方法的结合并不能为政治变革提供全面的解释,也解决不了社会科学这样一个基本的两难窘境——是准确无误地去解释琐细之事呢,还是粗略地探讨重大之事?我们在研究中已经选择走后一条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人们打算处理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般性的错误和某种过于简单化的现象则是人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我们的研究澄清了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诸问题,而不是使人们感到困惑,那么,牺牲这种准确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得益于一些机构的鼎力相助。纽约莱尔曼研究所(The Lehrman Institute of New York)提供了最初的工作基金并给我以精神鼓励。追加的财政资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它的冲突研究项目拨款。普林斯顿大学特许我告假离开教学和学术职位;该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国际研究中心也在财政等方面帮助了我。承蒙所有这些机构的支持,我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我得感谢那些对初稿提过意见或以其他方式帮助过我的个人。在此尤其想对与我讨论过本书初稿的同事、学生和其他人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是:戴维·卡普洛、迈克尔·多伊尔、罗伯特·海尔布伦纳、迈尔斯·卡勒、彼得·卡赞斯坦、马里恩·利维、吉姆·基格尔、罗伯特·基欧汉、迈克尔·洛里奥、迈克尔·马斯坦登诺、拉尔夫·彼特曼、马克·辛兹、戴维·施皮罗、肯尼思·华尔兹。我还受到我的同事威廉·布兰森的特殊恩惠,在经济理论对寻求解决政治变革的适应性问题,他曾给我以

指点,并且长年累月地为我辅导经济学知识。在波士顿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参加过我的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班和学术讨论会的研究生,也使我受益匪浅,他们提出的问题之多,远非我所能一一作答的。我还要感谢我的秘书多萝西·格罗尼特以及威尼弗雷德·多纳休职业打字行,是他们为我准备了本书的打印本。我的妻子琼在幕后默默地安排组织所有有关工作,她既是编辑,又是督促人,还是一位卓越的批评家。

最后,我要对已故的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表达我的敬意,并谨以本书献给他。尽管他从未读过此书,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并且可能对其中许多看法持有异议,但是,他对本书的概念作出过贡献,他的思想影响了本书及作者,其贡献和影响方式之多是他人难以意识到的。他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一位杰出带头人,并始终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列。我们这些有幸认识他并成为他同事的人,将永远珍藏我们对他的怀念。

注 释

1. 用这种方法分析政治变革的突出例子是哈斯科尔(Haskel)。他在1976年出版的《斯堪的纳维亚选择》(The Scandinavian Option)一书中,把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于外交决策问题。他的著作是一种开拓性尝试,这种尝试迄今已受到人们的注意,但还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2. 这种称为正规与实质的问题是人类学学者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与经济学学者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之间的一场著名交锋。赫斯科维茨最终作了让步,并且写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将正规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非市场经济的原始社会(Herskovits, 1952)。

目 录

序 /I

导言 /1

第一章 国际政治变革的性质 /7

理解国际政治变革问题的基本框架 /8

基本术语的定义 /12

国际政治变革的类型 /30

渐进性变革与革命性变革之比较 /34

第二章 稳定与变革 /40

影响变革的环境因素 /44

国际体系的结构 /65

变革的国内根源 /75

结论 /82

第三章 增长与扩张 /84

帝国的周期 /87

现代模式 /91

对变革与扩张的限制 /112

结论 /119

第四章 平衡与衰落 /122

影响政治衰落的内部因素 /124

影响政治衰落的外部因素 /130

结论 /142

第五章 霸权战争与国际变革 /144
结论 /161
第六章 世界政治中的变革与持续性 /163
当代战争中的核革命 /165
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性 /168
全球社会的出现 /171
结论 /175
结语 当代世界中的变革与战争 /178
参考文献 /188

导 言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发生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标志着国际关系正在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剧变。长期建立起来的似乎稳定的关系和理解的格局顷刻间被抛弃。政治领袖、学术评论家以及金融界名人,突然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能源危机、中东的戏剧性事件以及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等现象,都是在性质上不同于前十年的新秩序的发展;这些事态的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众多新情况表明,权力的国际分配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新的社会政治力量脱颖而出,外交关系也在进行全球性的重新组合。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事件及其进展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所了解的这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正在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变革时期。

目前这些突如其来的戏剧性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军事力量、经济利益和政治组合方面的基本变动,并非历史上的头一遭。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都发生过类似的重大变动事件。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政治上急剧动荡的不稳定时期所具有的内在危险,并由此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与恐惧,担心事态的发展难以控制,以至于世界可能再次陷入全球战火之中。学者、新闻界人士和其他人士纷纷求教于历史,期望知道眼下这些事件与1914年或1939年的那些事件是否同属一个类型(Kahler, 1979—80)。

当代这些事态的发展及其潜在危险,提出了涉及国际关系中战争与变革的一系列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国际关系会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是怎样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引起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起着什

么样的作用？在经济和政治急剧变化的时期，究竟什么地方存在激烈军事冲突的危险？还有，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那些从过去的历史考察分析中得出的答案对当代世界是否仍然有效？换言之，诸如国家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大、核武器的出现这样一些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在国际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作用？我们是否有理由期望，未来的政治变革会比过去所发生的变革来得温和些呢？

本书的宗旨就是要努力探索上述问题，并力求提出一种对国际政治变革的认识，这种认识将比现有的理解更加系统化。我们并不企图创造一种能提供包罗万象的答案的一般国际关系学说，而是想为人们思索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问题提供一个框架。这种理论框架的作用，不是对政治变革作出十分精确的科学解释，而是充当帮助大家整理和解释人类经验的分析工具。本文所提出的有关国际政治变革的思想，也不是以一系列业已受到历史事实科学验证的假说为基础，而是根据对历史经验的观察作出的归纳和总结。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作为对国际政治变革的发生方式的一种似乎有理解释而提出的。¹

为达到以上目的，我们把同国际体系变革有关的、表现比较明显的规律性情况与形态分门别类，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尽管如此，我们绝不是在声称：我们已经发现了“变革的规律”，这种规律决定政治变革将在什么时间发生，以及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发生。²相反，我们认为，重大政治变革是由一系列独特的、无法预言的事态发展的综合因素引起的。但是我们也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刻，人们有可能识别那些反复出现的形式，具有共性的要素和总的发展趋势。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 1970: 17—18)所指出的：“今天的社会变革进程同两千年前相比，几乎完全一样。……如果发生变革，我们可以说出它将如何发生，可我们却不能预见到将要发生的是何种变革。”

本书所提出的政治变革概念，像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概念一样，都不是预言性的，连经济学的预言性都只限制在非常有限的一些问题上(Northrop, 1947: 243—245)。政治科学领域中以及国际关系这一政治学分支中的大多数称之为理论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某种分析性和描述性的结构体；它们最多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概念框架和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帮助我们分析和解释某类现象(Hoffmann, 1960: 40)。正是由于这样，肯尼

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Man, the State and War)这本颇有蛊惑力的著作,并没有为人们提供预言任何特定战争的方法,而只是对笼统的战争作了解释。(Waltz, 1959:232)同样,本书也力求笼统地解释国际政治变革的性质。

威尔伯特·穆尔(Wilbert Moore)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最新版中,曾恰当地提出过更好地理解政治变革、尤其是国际政治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他说:“自相矛盾的是,现实世界所经历的社会变革频率已经加快,而与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有关的社会科学学科,却总是强调有秩序的相互依赖性和静态的连续性”(Moore, 1968:365)。

穆尔关于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政治变革所持的不合适态度的判断,可以从国际关系的教科书和理论专著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虽然最近有些特别例外的情况(Choucri and North, 1975; Keohane and Nye, 1977; Waltz, 1979),可是几乎没有几本教科书或专著系统地论及过政治变革的问题。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 1953:42)说得好:“研究政治生活的学者总是忘记,社会研究中真正的关键性问题,是那些与变革模式有关的问题。”³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954b: 964)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科学的自然发展都是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静态理论相对比较简单,这类理论的命题也比较容易证明。遗憾的是,如果研究领域的静态理论还没有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如果人们还没有很好地把握那些反复出现的进程和现象,要着手动态研究,不说是可能性不大,也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可以这么说,国际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许多被认为是动态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努力了解特定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静态特征,如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联盟行为、危机的控制,等等。问题是,目前我们对这些情况之静态方面的认识,是否达到了相当充分、相当高深的地步,以至能帮助形成一种动态理论呢?看来这个问题对我们当前的任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有助于解释政治变革问题为什么在前些年一直被明显忽视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霍尔斯特(K.J.Holsti, 1971:165—177)所说的“大理论”(grand theory)的衰落。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政治现实主义、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系统理论、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新功能主义,以及其他众多的“大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追求一种

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这些“大理论”都力求以自己的方式“把各种经验事实仅仅变成其总命题中的特定例子”(Holsti, 1971:167)。尽管他们的探索各有建树,可是,他们为认识这些问题(战争、帝国主义和政治变革)所作的任何一种雄心勃勃的尝试,都未能得到普遍的承认。相反,“在过去十年里,理论家们一直全神贯注于探索具体问题,为解释有限范围的若干现象提出假设或进行归纳总结,尤其侧重于搜集数据来考证这些假设”(Holsti, 1971:171)。总而言之,近来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所谓中型理论,尽管本身有价值,却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它转移了人们对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的注意力。⁴

忽视政治变革研究的第三个原因,是西方学者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偏见。对于一种以认识社会间相互作用为其义不容辞的理论义务的职业来说,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范围是惊人的狭窄,而且具有民族优越感。它基本上只是对西方国家体系的研究,而且在现有的理论著作中,相当大一部分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情况。因而,这个职业也就成了研究特定的国家体系内部最新进展的职业。尽管其中也有一些例外,但是,这一学科的从事者并没有被迫向这个特定的或任何其他国家体系的动态理论作出妥协。⁵正如马丁·怀特指出的,国际关系缺少一种政治理论化的传统(Martin Wight, 1966)。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对非西方体系可靠的辅助性研究所造成的。但这种情况本身无疑是发展国际政治变革理论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忽视政治变革的理论问题的第四个原因,是由于人们普遍确信,从事这项研究是徒劳无益的。这种观点在历史学学者中间煞是盛行,许多社会科学学者也持此见(Hirschman, 1970b)。由于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人们认为探索“变革规律”的努力会毫无价值。这样,对人类事务进行总结概括、归纳各种类型方式的探索工作,也被看成一项没有希望的事业。如果视其表面价值而接受这种主张,就会否定一种科学或社会历史的极大发展的可能性。然而,人们也应该注意持此观点者所提出的以下忠告:绝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变革规律;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反复出现的模式,社会变革最终还是由一系列独特的历史事件决定的。

最后,发展政治变革理论的工作还受到意识形态和情感方面的限制。其部分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科学中存在的保守主义偏见。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偏爱稳定,至少是偏爱有秩序的变革。那些威胁到通常公认的

价值观念和利益的激进变革思想对他们没有感召力。这个问题对国际政治变革问题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尤为尖锐,因为他们恰恰必须正视国际关系的最基本问题——战争。约翰·伯顿(John Burton)在一份历数当代国际关系学术问题的檄文中,充分指出了这个可怕问题的抑制性作用:

正统观念的主要缺陷是在变革问题方面。国际关系的动态性质是现实的一个显著特征。任何总体理论,如果不考虑迅速变化着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环境——国家需要在这种环境中和平相处,它就只是一种适合时宜的理论。但是,在权力政治条件下,进行基本变革唯一可能的手段就是战争。因为,合理的战争被人们公认为国家政策的一个合法工具。人们总是从静态方面来讨论国际关系,而往往把稳定解释为保持现状,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如果采取动态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那么,分析研究人员就会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争是变革唯一可资利用的机制(Burton, 1965:71—72)。

伯顿向国际关系正统理论提出的挑战,切中了本书研究的实质。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总是强调当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长、现代化武器的破坏力等情况)对缓和与稳定国家行为的影响。这些重大进展促使许多人相信:和平演变已经取代军事冲突,成为当代世界调整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与这种假说一起,还有另一种看法:国家的经济和福利目标已经压倒传统的权力与安全目标。因此,许多人认为,和平地进行经济交往的机会,以及现代化毁灭性战争造成的遏制力,有助于减少重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本书的立场与上述看法迥然不同。我们的立场以这样的假说为基础,即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取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修昔底德撰写的古希腊历史对当今国家行为的指导意义,并不亚于成书时的公元前5世纪。但是,世道本身却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本书的次议题之一,实际上就是想说明,现代治国谋略在一些重要方面同以前迥然不同。这种情况首先是由孟德斯鸠、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这些问题的早期学者所认识到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国际关系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⁶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早期学者的见识和历史的经验,对于理解当今时代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和产生变革的方式方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